

##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四十年来，无数爱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赶上先进的国家？也就是如何从故步自封的局面中解放出来，迅速地、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闭关自守是专制宗法社会的特征。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把人们束缚在狭小的地面上。由科举和理学作育而成的观念，禁锢着人的头脑，压抑着人的精神，使人们缺乏力量去想象和追求一个广大的、多样化的世界。当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逐步发展起城市经济、航海通商和近代文明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专制国家。直到英国兵舰驶进广州内河，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吉利在什么地方，与中国有无旱路相通。连头脑清醒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也曾以为英国兵的腿足不能屈伸，上了岸就不能打仗。这就像一个蒙上眼睛的人，遇到野心勃勃的对手，挨

打吃亏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林则徐、魏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从吃亏中吸取教训，最早提出应当了解外国（“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和学习外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所谓的“悉夷情”和“师夷长技”，都是为了“制夷”——遏制外国的侵略。他们不仅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也是为了祖国富强而探索走向世界的道路的先驱。中国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确实应该从他们写起。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从林则徐、魏源、洪仁玕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这一百四十年的前七十年中，并没有能够解决中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开始有了新的世界观。但是，一方面由于积重难返，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曲折和徘徊，后七十年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近几年纠正极“左”那一套之后，国家才有可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当然，国家利己主义是客观的存在，发达国家势必要占不发达国家的便宜。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也确有少数人屈从于列强，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但这种人绝不是林则徐和魏源，而是那些本来最顽固、最守旧、最保守的统治者。他们和人民尖锐对立，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能靠闭关自守保住江山。一旦“关”闭不住了，又是他们最怕老百姓乘机造反，最容易屈膝投降，崇洋媚外，在“保护伞”下去做儿皇帝和奴才总管。至于一百四十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他们赞成开放，反对封闭，是为了赶上先进国家，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绝不会拜倒在洋人脚下，成为洋人洋货的奴隶。

若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一番纵横观察，即可发现，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它既是中外交往史，又是文化思想史；既是政治史，又是生活史；既是“西学东渐”史，又是反帝斗争史。在今天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重温一下这些历史，我认为是十分有益和有用的。

前面说过，1840年英国打到广州来时，中国人对于欧洲还一无所知。关于“泰西”，通行的还是“洋鬼子挖眼睛合药”一类荒诞无稽的传说。怎样由无知变为有知呢？只能靠直接去接触和了解。1876年到费城参加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中国工商界代表李圭，在其著述《环游地球新录》中说：

地形如球，我中华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圭初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

这完全是实话。地球是圆的，今天连小学生都懂得；但在当时，却振聋发聩，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戊戌领袖康有为，就是在他22岁读了《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后，才立志“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再以对荷兰的了解为例，《明史·和兰传》云：

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发眉皆赤，足长尺二寸。……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

不沉，走海面若平地。

这明显是荒诞的“天方夜谭”。但斌椿于 1866 年访问荷兰后写的《乘槎笔记》，和《明史》就完全不同，可以说是‘纪实’了：

荷兰纵六百五十里，横三百五十里，西北滨大西洋海，夷坦无山，港道纷歧。民受水害，因习水利，善筑堤，又善操舟行运。南洋各岛国，皆建立埔（埠）头。

由是观之，所谓“百闻不如一见”，确实是不错的。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对外部世界由无知变为有知，封闭社会也就自然会变为开放了。

当然，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19 世纪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为了扩大眼界，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学习先进，救国救民。在这方面，人们往往需要克服比远海高山更难超越的障碍。当第一位常驻欧洲的使臣郭嵩焘接受任命时，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骂他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者把外国人一概骂为‘鬼’，把正常的外事活动斥为‘事鬼’，倒可说为一百年后戚本禹之流指使红卫兵烧外国使馆的“不怕鬼”

行动开了先河。其实，这不过反映了破落户对新世界和新事物的盲目恐惧和极端仇视，和人民群众对列强侵略的抵抗和愤怒，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研究人类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一种文化绝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有没有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的能力，正是衡量一种文化生命力强弱的标志。到清朝末年，统治者的思想已经完全僵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危机；但是植根人民、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没有和专制统治一样完全老化和衰朽，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

曾纪泽出使英法时，也遇到了和郭嵩焘同样的情形。不少人反对他讲西学、谈洋务，说什么凡是先圣昔贤没有记述过的道理，凡是六经典籍没有记载过的东西，学者都“不得过而问焉”。曾纪泽在一篇文章中驳斥他们道：

夫先圣昔贤之论述，六经典籍之记载，足以穷尽宇宙万物之理若道，而不必赅备古今万物之器与名。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概然操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以唐塞之，不亦泥乎？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舞于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创局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

曾纪泽并没有否定“先圣昔贤之论述”、“六经典籍之记载”，但他

强调指出，不能靠“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来适应“五千年未有之创局”。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已经不在人间，他们并不了解当今的世界。对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由我们自己通过直接接触去考求，这样才能扩充我们的知识，应付当前的局势。对于这件事情，是既不应简单拒绝，也不必畏缩害怕的。

“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这是一种何等博大宽容的态度啊，它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一部分的积极的传统，说明古老的中国文明还是可以“与时俱进”的。当然，这也得有曾纪泽这样“不以其异而诿之，不以其难而畏之”的态度。应该说，在早期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持这种态度的人相当多；忘记祖宗、盲目崇外的人当然不会没有，但这种人在历史上是毫无地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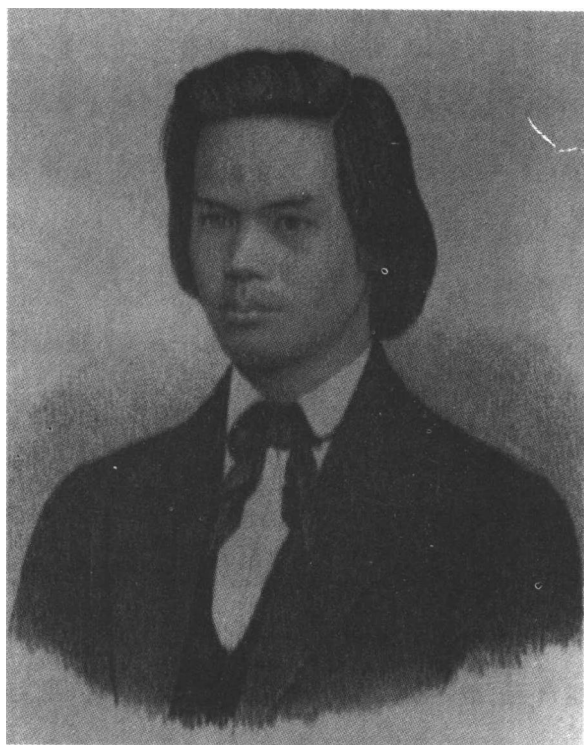
欧洲（后来还包括美国和日本）用几个世纪时间，在吸取东方、南方和新大陆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是全人类都有权继承的公共遗产。连曾经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19世纪“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19世纪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所想要“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的，首先是坚船利炮，接着是化电声光，最后终于接触到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在这方面，直接的接触和观察，对于人们认识的提高和深化，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中说：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羨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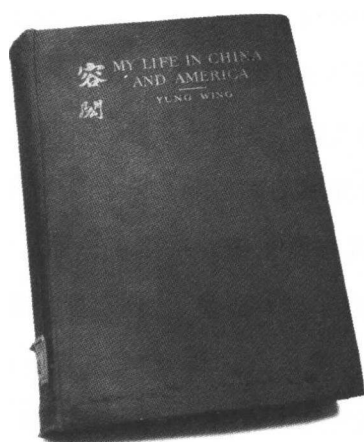
到他之后的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就更上一层楼，正式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西方的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他们的理想落了空，但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永远也无法否认的。

对于西方文化中那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对于某些西人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大部分出去的人也并非不能够及时识别并进行反击。张德彝和同文馆同学到欧洲游历时，年纪只有十八岁。据《航海述奇》记载，有次他们在英国参观博物院，见到那里将从圆明园抢去的文物作为战利品展出，便立即中止参观，表示抗议。后来在俄国公园里遇到一群妓女，有个外国人故意跟他们开下流玩笑，问他们想不想‘及时行乐’，张德彝又正言斥责，直到外国人表示道歉。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从细小的地方，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青年在外国人面前的精神状态。

由五千年历史冶铸而成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精神，渗透在中华儿女的血液里，绝不是几番欧风美雨冲刷得掉的。《西学东渐记》作者容闳的父母，送他到外国人那里读书，本来只是“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可是当美国教会提议资助他进大学，条件是“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时，年轻的容闳立即断然拒绝。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



容闳在耶鲁, 1854



原版《西学东渐记》



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1854 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时，有不少人劝他留在美国工作。但他的考虑是：

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为了“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宁可牺牲个人的机会，回国来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这样的爱国精神，在容闳以后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国留学生中，不是一直屡见不鲜吗？我在《容闳和西学东渐》一文中，援引过英国 H. N. Shore 1881 年评论容闳的一段话：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可以看到，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唯愿诸位读者，能够和我一样赞赏和理解这一段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 论黄遵宪的日本研究

### 1

日本和中国是东亚的近邻，古代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却非常之少，这不能不说是‘不勤远略’的政治哲学和‘足乎己无待于外’的文化心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叶西潮东渐，两国同时受到冲击，可是日本的西化即现代化很快就远远走到了中国的前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向日本学习。只有到了这时，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蜕化的有维新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才开始自觉地研究日本，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在这方面，第一个做出了贡献、产生了影响的人就是黄遵宪。

黄遵宪研究日本的成果和他的研究思想（以及他的整个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写的《日本国志》（1878—1887



黄遵宪画像

写成,1895 刊行)和《日本杂事诗》(1878—1879 写成刊行)两部书里。其《日本国志书成志感》诗云:

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攄。

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sup>①</sup>

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

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诗云:

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

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

王母环来夸胜典,吾妻镜在访遗编。

若图岁岁西湖集,四壁花容百散仙。

“草完明治维新史”,说的是他著《日本国志》这件事;“吟到中华以外天”,则是说他在国外写成了《日本杂事诗》;“千秋鉴借吾妻镜”,意思是应当借鉴日本的历史经验;“改制世方尊白统”,明白地宣布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改制”,也就是变法维新;“罪

<sup>①</sup> 《吾妻镜》,书名,52 卷,镰仓幕府编,记治承、文永间(1180—1266)史事,一名《东鉴》。吾妻,日音“あづま”,有东国之义,盖指镰仓、江户等京都以东之地。传说武尊皇子东征渡海,风涛大作,有橘姬代皇子投海祷神得止,及凯旋,皇子东望叹曰:吾妻独不能归乎。故旧称关东为“吾妻(孀)国”。东京又有“吾妻桥”。

言我窃比黄书”，把自己的书比作反清遗民的著作和“不当位而言实有罪”的杜牧《罪言》，著书的政治倾向是十分鲜明的。

## 2

中日两国之间的一衣带水，在现代只需一个多小时便可飞越。可是，唐朝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九死一生，方才到达彼岸。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从唐朝回国，海上遇难，竟漂泊到了越南。可见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一衣带水却是阻碍人们交通的天堑。

但限制人们脚步和视野的，不仅仅是高山和远海，《日本国志·自叙》说得好：

自封建废而为郡县，中国归于一统，不复修遣使列邦之礼。……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事，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在古代历史上，日本人到中国来的，确要比中国人到日本去的为多。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仙，究竟是否到了日本，暂可存而不论。

历代中国史书,关于日本(倭人、倭国……)的记载,几乎都是得之于航来的日本人。

《汉书》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

《三国志·魏志》记述了景初二年(238)六月“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的情况。

《隋书》载有大业三年(607)倭国“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国书。

到唐代,日本“遣唐使”来中国,已经成为经常的事情,出现了阿倍仲麻吕和空海这些著名人物。当时李白、王维等人都有赠阿倍仲麻吕(晁衡)的诗作,可是他们关于日本的知识却毫无表现。

唐朝的兴盛时期过去后,走下坡路的专制国家越来越内向。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给被杀的人一律加上“通高丽”、“通日本”的罪名,其实何尝有这么回事。他在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正式把日本列入“不征诸国”;“不征”就是“不理”;“不理”就是“理不了”。但是,你不去,不等于他不来。由日本浪人组织的倭寇,在明朝就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害。丰臣秀吉的军队,也渡海打到朝鲜,威胁到中国边疆。这就说明,随着历史的进步,世界各国之间迟早不能不打交道,这一点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到明朝中叶,中国才出现关于日本的私人著作,但多据传言,缺少价值。可以提到的只有薛俊的《日本考略》记录了三百五十八个日本词语的汉语对音,郑若曾的《日本图纂》根据商人的叙述画过一些日本风物,稍微值得一提。

明亡以后,一些文人逃到了日本,在台湾抗清的郑成功也是

中日混血儿。这更加犯了清廷的忌讳，成为康熙皇帝在一度开放海禁之后很快就更严厉地实行“禁海”的重要原因。差不多同时，日本德川幕府也厉行锁国，只允许少量中国商船到长崎进行严格管制下的贸易，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仍旧无法深入。雍正年间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和乾隆年间汪鹏的《袖海篇》（1764），因为作者曾随商船到过长崎，所以有一些实地的观察。陈书记录了当时的一条谚语“日本好货，五岛难过”。汪书说长崎“风土甚佳，山辉川媚，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儿女”。还有一个福建人沙起云，也写过十六首《日本杂咏》，描写长崎的风俗。但由于他们的足迹只限于长崎划给中国商人居住的“唐馆”，见闻仍然是浅陋的。陈伦炯便把日本错认为是由长崎、萨 崎马（萨摩）、对马“三岛”组成的国家，简直有点类似于瞎子摸象。嘉庆年间，吴江人翁广平据历代史籍，兼采朝鲜日本之书，辑成《吾妻镜补》二十八卷（1814）抄本现存北京图书馆，也只是资料重编，且多讹误。由于对日本的无知，乾隆年间查禁私钱时，在沿海发现一枚日本的“宽永通宝”，竟成为震惊中国朝野的大案（因为改元立号、铸造通货等于建立新国新朝）。皇帝严询各省大吏，“守令仓皇，莫知所措”，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枚铜钱的来历。这种情形，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仍没有多大改变，无怪黄遵宪要浩叹“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了！

1840 年以后中国亲历日本并留有记述的第一个人当是罗森<sup>①</sup>，1854 年所写《日本日记》，述其随美国‘黑船’到箱馆所见云：

往游町上。百姓卑恭，敬畏官长。人民肃穆，膝跪路旁。不见一妇人面。铺户多闭。因亚国（笔者按：即美国）船初至此，人民不知何故，是先逃于远乡者半。盖以温语安抚百姓，乃敢还港贸易。

还是刚刚从锁国中开放的情形，甚至比中国还不如。

黄遵宪于 1877 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已在罗森之后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中日两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的变化尤其巨大。闭关锁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旧的权力中心幕府的倒台。1867 年，执政了二百多年的德川家族最后一位将军庆喜，被迫还政给天皇。1868 年，年轻的明治天皇依靠一批有新思想和新办法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年纪最大的岩仓具视四十六岁，最小的伊藤博文刚刚三十岁），宣布‘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打破从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这就是有名的明治维新——日本开始全盘西化，也就是

①罗森，字向乔，广东人，1854 年（中国咸丰四年，日本安政元年）自香港随美国柏利（Perry）舰队到日本，其《日本日记》最初刊载于香港《遐迩贯珍》月刊 1854 年 11、12 月号及 1855 年 1 月号。



现代化。这样做的结果,真可说是‘立竿见影’,等到何如璋一行东渡时,他们所见到的日本,已经和罗森眼中的大不相同了。

直到此时,国内士夫对日本的情形仍很隔膜。陈其元 1874 年著《日本近事记》,把倒幕说成是‘废其前王’,维新则是‘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sup>①</sup>于是通国不便,人人思乱”。他甚至异想天开,建议清廷派兵跨海征东,帮助幕府复辟。而何如璋身历其境<sup>①</sup>,见解便有所不同,他在《使东述略》中写道:日本‘初与米利坚通商,欲锁港拒之,后又仿其法之善者,下至节文度数之末,日用饮食之细,亦能酷似,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但何如璋毕竟不过是一平庸官僚,留东三年,和日本人的诗酒应酬不算少,却谈不上对日本作认真的研究。

黄遵宪位在僚属,思想见解和研究精神却远远高出何如璋不止一头,他从到日本的第二年就着手准备著《日本国志》。何如璋三年届满,黎庶昌继任,黄氏仍留使馆,研究继续进行。1882 年调美国旧金山时,《日本国志》的材料已经大体搜集齐全。1885 年假归,重经日本,及还家,他‘闭门发篋,重事编纂(《日本国志》),又几阅两载’,完成了初稿。1890 年应召随薛福成使英,旋又到新加坡当总领事,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没有完全搁置对日本的研究和对著作的修改,《日本国志》到甲午(1894 年)后才刊行,《日本杂

<sup>①</sup>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大埔人,清国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有《使东述略》及《使东杂咏》。归国后任福建船政大臣,中法之役,因失机先逃被严谴,时论薄之。